

“交 通”被 捕 以 后

尚寅宾

一九三九年八月初的一天上午，王东旭匆匆来到我家，说：地委交通李圈昨天从洛阳担书回来，路过牛店被四区署逮捕。押送县府途经西大街时，突然闯进我家大门，说自己因担书被捕，表现惊慌。当时王东旭怕他应付不了，就叫他把书的事情推给王新法，说明自己是挑书苦力，其他一律不知。王东旭随即叫王新法去县府交涉，承认李圈是自己雇的挑夫，书是自己在洛阳街上买的。结果县政府又把王新法扣压起来。李圈担的书是河南省委发给密县地委的。这些书都是延安解放社和重庆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红色读物，历来是属于国民党的查禁之列。王新法是中共党员。地委的发行机关公开名义叫《行都日报》派报社，由它负责转递。后来王东旭又说，李圈被捕可能危及司树森。他来我家就是为了通知司树森提高警惕。

司树森和李圈的家都在龙窝，距离我家约二里路。我介绍司树森入党，司又介绍李圈入党。龙窝村支部有十余名党员，是一个团结战斗的堡垒。地委的同志经常住在司树森家。司树森家境贫寒，曾自卖自身替富家子弟在冯玉祥部下当兵，回到家乡又给樊百全当护兵。一九三八年我们活动他离开樊百全到河南省委办的确山学习班受训，他勤奋好学，积极肯干，入党一年就当了县委的组织部长。其妻梁大莲也是党员，晚上一个人敢到十余里外的樊寨送信，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李圈贫农家庭，石匠。经过党组织培养，出过几次远门，当了地委的交通。

我同意王东旭的意见，当即写个条子，由我弟弟送交司树

森。因为司树森不在家，把条子留给其妻，她答应树森回来马上叫他见我。正在吃午饭时，梁大莲跑来了，她说，司树森从二区工作（地下党工作）回来，正要来我家，刚出门被一区的区丁碰上给叫走了。我们感到形势进一步严重，立即放下饭碗，赶赴地委机关报告。地委机关具体位置在塔山后沟一家农民院内，这里属第一区第四联保管辖。联保主任郭风楼（又名郭介文）和保长、甲长都是共产党员。地委办公处的院落依山临沟，遇事容易脱身。后于一九八一年我和王东旭特意登门重访，可惜地委的房子塌了，房主人搬家了。邻居热情叙述了当年的情景，讲述住机关的那位女同志，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由甲长送走的，她刚走，逮捕她的人就到了。

当时，我们向地委汇报之后，地委领导决定立即动身去洛阳向省委书记汇报，并要我俩住在地委机关听候消息。

“住机关”是地下工作的用语、即由一位女同志扮作家属，以便租房和麻痹敌人。这里住机关的女同志称大嫂，巩县人。据说她婆家很有钱，丈夫死后参加了共产党，很坚强。密县党组织被破坏后，她到碓山竹沟工作，碓山事变中牺牲了。

李圈、王新法、司树森三人被捕之后，形势出现了停滞状态。共产党方面地委认为事情重大，须要派人去洛阳向党委请示报告；国民党方面也认为事情重大，意见不统一，须要派人去洛阳向他们的上级请示报告。所谓不统一，是指有人主张杀一儆百，有人主张一网打尽。这个情况是我们党员郭鸿仪同志从李性甫那里打听到的。李性甫是个老秀才，他的大儿子在民政厅任科长，新来的县长孟祥霖一到任就拜他的门子，他也成了决策人物。郭鸿仪从小认他为义父，通过义父搞情报是很方便的，郭鸿仪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但有一次遇到了惊险：他经常在进出城时尽量避开大街，串小巷，钻胡同。有一次他绕到北街，这里比较偏僻，碰见熟人的机会较少，把草帽拉得很低，遇上熟人装作

没看见。他万万没有想到偏在行人很少的背街小巷被孙敏看见了。这个孙敏也很怪，看见郭鸿仪就大声喊叫：“鸿仪！你为什么到大门口不进来坐坐？真看不起人啊！”说什么也不放他走，郭鸿仪只好随她去了。进了大门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家最保险，王寿山就住在里边”。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郭鸿仪一下子紧张起来，心突突地跳，但又不便说明情况。孙敏说：“王寿山出去了，你尽管进来坐”。刚落座，传来敲门声，孙敏去开门，郭鸿仪尾随其后，在大门以里，二门以外的一间空屋隐蔽起来，清清楚楚地看着王寿山进了二门，郭鸿仪顾不得告辞，甩开大步走出城外。孙敏和共产党没什么接触，她对郭鸿仪这样作，完全是处于同学的情面。王寿山是个大特务，一九三九年春，奉命来密县，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的罪恶勾当。在地委领导下，密县县委与樊百全通力合作，胜利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斗争。他找很多人谈话，有共产党员，有党的同情者，也有落后分子，但无一人暴露党的机密。搞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只好收兵回营，去到登封。李圈被捕后，他又返回密县。他与县长孟祥霖等一伙合谋制造了一起破坏共产党的反革命事件（通称密县事件）。

我和王东旭在地委机关住了三四天，仍不见去洛阳的同志回来，觉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天下午我俩离开地委机关，猛扑县城西关菜园沟张天福家。他是我在完小、县中、洛师的老同学，毕业后回密县县中教书。虽不是共产党员，而我们友谊不错。他的哥哥张天德是染匠，在樊百全的工会中当头头，一九三六年被地方反动派枪杀。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他不会陷害我们。不出所料，张家非常热情，天德大嫂还特意作了一顿可口的家常便饭。听天福介绍情况，近些天比较平静，与郭鸿仪了解的情况一致。我们顿起进城打探情况的念头，稍有表露，天福就说愿意带路。他领着我们从小路进城，遇见哨兵由他应付。进城后直捣县党部，想安慰一下樊百全，了解点情况。经过几次叩

门，听见有人缓缓而来，他用两只手扒住两扇门，慢慢拉开一条缝，探头探脑地盯着俺仨，放低声音说：“是你们呀？！”说话时两手仍然抓住大门不放，丝毫没有允许进去的表示。我们说：

“想看看樊先生。”他着急地说：“王寿山就在里边，你们快走！”随即把门关上。这个人叫尹光明，在农会工作，一九三七年春，在抢粮运动中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

离开县党部已是夜深人静，王东旭引我到他家，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是愁眉苦脸，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能在这时候回来。这位老人开一个染布作坊，种十余亩良田，生活宽宽绰绰。一九三八年以来，这个家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招待所。来往同志吃住不断，老母亲拖着一双小脚弄吃弄喝，受苦受累，从无一句怨言。老人吐诉了惦念之情，悄悄地说：“保长王炳南亲口讲，县长有部署，发现王东旭回家立即报告。”劝我俩千万不能露面，也不能常躲在家。这天后半夜下起瓢泼大雨。老人说待雨停了，你们就出后门顺玉米地溜走。我们没有接受老人的劝告，认为雨过天晴正是突然袭击的好时机。雨刚停，就乘老人不备，忽然把临街的大门打开，挺胸阔步出现在西大街上。人们用惊奇的目光盯住我俩，不敢靠近，不敢说话，最要好的朋友也只能以目示意。如此严重的恐怖气氛，更使我们感到压风的必要，尽量表现出真理在我，无所畏惧的气概。出了东门才放下架子加快了步伐。越过太山庙岗就是龙王庙。这里正唱大戏过立秋会。我们刚住脚，县大队队长王汉杰跟来了。他带着两名护兵，见面就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我们说：“看戏。”故意表现出不卑不亢漫不经心的气势。他又说：“你们走吧！今天的戏不好看。”说着话他进了庙门。过有两三分钟，他又出来了。看见我俩仍然若无其事地站在庙门口，就板起面孔，提高嗓门说：“我的话你们懂不？今天的戏不好看！”我们说：“懂得你的意思，你先走吧。”看着他走后，我们也大步流星地离开龙王庙。实际上，王汉杰说第一句

话，我们就明白了，硬坚持几分钟并要他先走，是为了显示共产党人不畏强暴、不受人辱的高尚品质。王汉杰和樊百全的关系较好。反动派抓住共产党打击樊百全的阴谋他是清楚的。抓共产党越多，他们包庇共产党的问题就越大。因此，他所采取“放”的办法，比采取“抓”的办法对他们这些人更为有利。

离开龙王庙，避开第一区公署，顺小路回到我家。这天正是立秋，北方人把秋季称作金秋，意思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农村应该是人欢马叫，充满生机。可是我家却没有秋的欢乐。婶母和妻子像躲兵匪一样，带着孩子各自回了娘家。奶奶和弟弟强打精神下地去散心。只有父母亲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见儿子回来真是喜出望外。母亲淌着眼泪笑了，父亲也笑了，但不停止地唉声叹气，他们刚才正为我们的下落不明发愁。父亲说：“那些书（马列著作）已经装进麦秸垛，可以放心了。”又说：“你们不能久留，要赶快走。前天区里的宋仙階来咱村，开始在我家周围转悠。我发现了就请他到家里坐。他说：‘不好意思呀，上边叫我来抓寅宾，抄家咋办嘛！’”我父亲说：“公事公办，这不难为你。”到家后，我父亲又问：“你看怎么抄法？”宋说：“抄什么呀！你把寅宾的东西拿一件给我，证明我来过就交差了。”我父亲拿出一本学生军训的书，他满意地带走了。宋仙階又名宋金丹，我和王东旭在一区任区员时他是文书。此人八面玲珑，老于世故，人送外号“车子”，意思是不推不动，遇事推诿不得罪人。上述抄家之事，符合他的处世哲学。

我的父亲年轻即当家理事，有一副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多年来我对他是敬而远之，感觉不到父爱。经过这次变故，我的看法变了。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他竟不责备我，也不埋怨共产党，反而甘当风险，为着保护我们进行了一场巧妙的周旋，这是多么可敬啊！在家里母亲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俩就走了，一别就是十七年。

在这不平凡的岁月中，密县地下党员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英雄事迹层出不穷。龙窝支部书记张青云同志的妻子就是一例。她是一个不敢和外人说话的小脚妇女。入党之后，经过教育能够参加送信、放哨等活动。大道理懂得不多，但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忠心耿耿。李圈、司树森被捕之后，张青云同志躲起来了，由她支撑门庭。面对着组织发给的党员识字课本，她开动了“机器”，心想，这书一不能让敌人发现，二不能轻易销毁，家中又无安全之处可放，怎么办？最后她使用了农民对付土匪的办法，把课本放在最不起眼的麦草堆下。一天反动派来搜查了，很快翻了个遍，但一无所获。有个家伙看见麦草堆准备下手，她急中生智，把怀里的孩子掐了一把，孩子哇哇大哭，她就顺势坐在草堆上，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在当地坐在草堆上给孩子喂奶是风俗，女人坐的地方，男人不能靠近也是风俗。就这样，我们一个普通女党员把一群狡猾的敌人欺骗了。

我们经过十七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全国解放的辉煌胜利，我们也获得了新生与幸福。

直至一九五五年春节，我和爱人黎影同志才回家探亲。经过长期战乱，家里的房子更破旧了，但到处都充满着欢乐。我弟弟是初级社的积极分子，拿出多种奖状给我看，还专门买了一条大前门烟招待我。全村的长辈都说：“宾呀！共产党真好，你大爷可真是翻身了。”我串了各家的门，翻看了他们的粮食和箱柜，确实比十七年前不大一样了。听到家乡人民诚心诚意地说共产党好，我高兴，我愉快，我感到鼓舞。

作者尚寅宾同志，1918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密县地下党工委书记。全国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陕西、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1990年离职休养。

去延安

尚寅宾

去延安，学理论，看毛主席是地下党员的普遍愿望。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青年学生因不满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也纷纷到延安寻求真理。有一首顺口溜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去找土八路。”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到延安的愿望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实现的。一九三九年八月，由于密县县委“交通”被捕，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和王东旭在国民党大肆捕人的情况下，离开惠沟亲戚家，由佃户陈旺带领走小路、钻山沟，经荥阳、汜水、巩县到洛阳。在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详细汇报情况之后，他要我们去确山竹沟省委办的训练班学习。我们要求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军事，刘子久没有同意我们的意见。最后决定去延安，我们非常愉快地同意了。离开洛阳时，我们佩带八路军的臂章、符号，拿八路军的护照。党的介绍信是一小片纸，打成象火柴梗粗的纸捻，外包一层腊纸，由我藏在身上不易发现的地方。受气的地下共产党人，一旦武装起来，真是神气十足，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如入无人之境。臂章上的“八路”二字非常引人注目，但只有杂牌军的人和我们打招呼。他们认为八路同样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斥，也属杂牌之列，因此有同情感。其它各界群众都是以目传情，表示友好。

当时日军占领风陵渡，架设固定炮位，对准黄河南岸陇海铁路的开阔地带，发现火车就开炮。火车通过这一地段要关灯、闭气全速，趁打炮的间隙飞驰而过，人们称之为闯关。闯关前，在阅

乡车站所有乘客都要下车，步行六十里，在潼关车站上车。中间经过阆德镇住一宿，这是一个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畸形小镇，不靠村，不临店，搭起一片席棚，供过路人食宿。这一段徒步行军，对于两个公开的八路同志可真是够艰难的。我俩人不敢离开旅客大队，不敢住稍靠两头的店。在华阴车站还遇上一次检查。查车的是国民党军的警备司令，少将衔，对象是军人，重点自然是八路军。他认真的查验护照，反复的盘查问话，因为我们的一切手续完备，无懈可击，只好放行。

夜间车到西安，出站时又一次遭盘查，是宪兵进行的。因为是普遍检查，来不及认真，只看一下打开的包袱就通过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围住有警察局保警队，隔壁是国民党陇海路特别党部，门口不少收破烂的、摆小摊的、拉洋车的，其中有一些人是特务，也有一些是我们地下党安排监视敌人保护办事处的。那些赖皮狗很难对付，他们伪装成“劳动者”，你不好向国民党交涉，只能转弯抹角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李克农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他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在桂林办事处周围的特务分子中，有一个化装的人力车夫最坏。有一天他叫了这个人的车，李克农是大块头，“车夫”不敢不拉，可又着实害怕，没走几步就问：“先生去那里？”李克农说：“你不必问，只管拉着跑吧！反正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有钱你就得出力。”这一次把这个家伙整苦了，以后再也不敢蹲办事处门口，看见李克农就迅速躲开。

“八办”住七贤庄，这里有一排东西走向的平房，分作若干院落，“八办”占着一、三、五号院。院落虽小，确象茫茫大海中的灯塔一样光辉夺目。国统区的大批革命青年经这里到“抗大”、“陕公”、青训班，通过短期训练，又经这里到华北、华中和大后方。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贴在墙上的国际歌，在这里我第一次把战友公开称同志，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红小鬼。他们是

十几岁的孩子，在红军西路军失败时被俘后，不忘本，不变心，经过许多波折，终于回到自己的队伍。

在“八办”住有一个星期，有一天我们已上了去延安的汽车，河南省委来电报又叫我们回洛阳。到洛阳后刘子久要我和王东旭以抗日青年代表的名义拦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汽车，告反动派迫害密县抗日青年的罪行，并说省委给我们请律师，律师就喜欢打这种出风头的官司。我们认为这个办法作起来困难很多，首先是向国民党告国民党很难胜诉，其次我们是被追捕的人，告状等于自投罗网、送货上门。刘听了我们的陈述后放弃了拦车告状的念头。

我们第二次返西安时，在洛阳城内的十字路口遇见了郭风楼和郭鸿仪，他们也是在大搜捕时来洛阳的，因找不着“八办”，只好借住在一位姓杜的同志家里，这位同志曾在密县作过地下工作，郭风楼当联保主任，负责掩护他。郭家兄弟为了找组织每天到处转游，突然碰上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愁眉为之一展，我俩也是又惊又喜，危难中异地相逢，倍感亲切，当即把他们领到“八办”，介绍给刘子久。后来听说，刘子久又布置张世民他们三个人秘密回密县发动被捕人员家属到洛阳告状，但大多数人认为亲人在押，告不成反会吃亏，因而没有成行。二郭的父亲是堂兄弟，两代都是单根独苗，性格各异。郭鸿仪的父亲重经商，在城里开有商店，富有冒险精神。他对郭鸿仪说，要干就远走高飞，干到底，不胜利不要回来。郭风楼的父亲则比较保守，胆小怕事，守着几十亩山坡薄地勤俭度日。郭风楼最后离家的当晚，老父亲摆上一桌供品，要他跪下向祖宗告别，求神灵保佑。郭风楼认为共产党不信鬼神，不愿下跪，老头子硬是揪住耳朵强迫其向祖宗叩拜。郭家两位老人和其它被捕同志的家属通过密县事件结下亲密的友谊，他们都盼望共产党早日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早日垮台。

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坚强的老人，他就是司树森同志的父亲。老人无大号，小名司猪娃。一九四四年当八路军皮定钧部挺进豫西的时候，党员家属都非常高兴，但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司老人是个直性子，捺不住满腔义愤，偷着给人说，这次树森（司树森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长，后到新四军工作，参加过抗日战争，进军东北，解放广东及入朝作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回来，我非报仇不可。反动分子本来就恨司老人，听到这番话更下了斩草除根的决心。一天晚上，派人敲老人的门，佯称是八路军，请老乡带路，老人一下激动起来，说你们可来了！为了报仇，我把儿子也叫上。老人受骗了，父子俩被一起杀害，投进一个枯井。一九五五年我特意到这口井处向尊敬的老人默哀致敬。

二次返西安之后，郭鸿仪他们也赶来了。办事处安排我们乘运棉花的胶轮大车去延安，共二十余人，除一位押车副官外都不是军人，有重庆来的，有兰州来的，也有前方来的，每人发一支步枪，佩带臂章符号。符号是老的，西安至延安、延安至西安反复使用。你的符号写什么名字，你就得叫什么名字。临出发前开一次会，办事处的干部告诉我们：遇到盘查时由副官对付，别人不要说话。副官常跑这条线，也流露出很有把握的样子，不要我们作任何准备。没有想到过渭河就在草滩发生了麻烦。这里有国民党的检查站，不接受副官的交涉，坚持进行检查。我坐的大车正冲检查站大门，第一个就叫我下车，幸好，我在密县就看新华日报太行版，对晋东南根据地情况有些了解，才得以顺利蒙混过关。下边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话：

问：“你从哪里来，到那里去？”

答：“从总部来，到延安去。”

问：“总部在哪里？”

答：“总部在长治。”

问：“你过去干什么？”

答：“在安阳纱厂作工。”

问：“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

答：“因为八路军抗日。”

对这样的答话，他们不断摇头、咧嘴，表示不相信的样子，但抓不住把柄，也难以制造事端，刁难几小时之后只好放行。晚上住在农民家，吃了一顿糊糊面。玉米面粥加上几根面条、白菜、萝卜、辣子煮在一起，吃起来热乎乎的很开胃口。由于肚饿的原因，大家都吃了很多，印象也很深刻，至今回忆起来还流口水。

次日上渭北高原，踏上咸（阳）宋（家川）公路，这是关中通陕北的唯一公路，沿线国统区各县都设有三青团“招待所”，专门截留奔赴延安的抗日青年，把他们收容起来，强迫送进胡宗南办的战干四团特训大队（后改名劳动营），这是一座坑害革命者的地狱。

进边区以前，强调集体行动，以防不测。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班的八路军，他们属中央警卫营，是护送林老（伯渠）由重庆返回延安的。虽然是一个班，但佩带着一色的盒子砲，个个仪表堂堂，比起沿途驻扎的那些国民党保警队要神气得多。这一班人确实长了我们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以后连续五、六天行军没有碰上任何麻烦，顺利进入陕甘宁边区。

越过富县的界子河，登上阳泉塬，一个个揪着的心一下子放下了。这里是共产党当家的边区，在这里第一次看见自己队伍的岗楼，第一次接触到解放了的人民，处处感到安全，处处感到温暖。界子河虽小，它的两岸可真是不同的两重天啊！

到延安后，我和王东旭进中央党校，郭风楼、郭鸿仪和张世民进了陕北公学。当时中央很重视培养干部，陈云、邓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都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陈云同志边讲边表演，善于深入浅出，用平凡的事例去解释高深的道理。有一次他讲到

不能绝对化看问题，举了毛主席一个生活方面的例子。医生建议毛主席不要吃辣子，说了许多吃辣子的坏处，毛主席说我不吃辣子不能吃饭，你看是吃辣子也吃饭好呢，还是不吃辣子也不吃饭好呢？医生的绝对论终于被毛主席的辩证法战胜了，连说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还是吃辣子也吃饭吧！邓发当校长就住在党校，虽出身海员，文化底子不厚，但很勤奋，每天早上起来就高声朗读俄文。上党建课时逐段辅导共产国际纲领，备课非常认真。党校的大门口有座能容纳四、五百人的房子，叫做陕北大礼堂，是当时唯一能够举行室内会议和演戏的场所。吴亮平、杨松经常在这里讲大课，我们遇到这种机会就去听。马列的书象美食一样诱人，不少人因读书用脑过度出现神经衰弱。有一段时间党组织的任务不是动员大家用功，而是动员大家休息。邓发和副校长谢老经常查窑洞，把那些不肯放下书本的人“赶出来”。

那时节洋教条和党八股还很有市场。以王明为代表，讲马列主义总是大一、二、三套小1、2、3，开口称希腊，而死不谈中国。毛主席批评的那位讲经济学不会解释“边币”的人就是中央党校的教员，他能大段背诵《资本论》，讲课很受欢迎，但一再声称，他只讲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学习方法强调两个字，没有时间就“挤”，不懂就“钻”。提倡读原著。我在中央党校两年中，逐句逐字读了《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读了两卷，还联系《联共（布）党史》读了大量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经过自己的努力，攻通一个难题的愉快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学习努力，被选为小组长。全组团结好，学习好，被称为模范小组。教育科长杨英杰召集全校小组长大会介绍我组经验。支部改选时，很多小组提名我为支部书记候选人。

中央党校的民主风气很盛，在谢老主持下每半年开一次民主

大会，全校学员和教职员工坐在一起总结工作，开展批评。对什么人都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周恩来的副官是从重庆回来的，在大会上批评党校的伙夫比国民党还厉害，这话被邓发知道了，在总结讲话时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炊事员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不关心、不尊重他们，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含义。这是一次生动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同学们受益很深。

方仲如是校务主任。校务处的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科长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觉悟高，干工作认真负责，个个都是老黄牛，但就是缺少文化，也不相信知识。有一次方仲如反复交待负责修建房屋的科长要注意采光充分、空气流通，这位同志很不耐烦，竟说什么空气、空气，我不吃空气也没有死人么！还有一位炊事员拒绝护士打针，他说，我明明肚子疼，你为什么不扎肚子，扎胳膊。他不爱学文化，上课时故意用手堵住耳朵。方仲如为了引起兴趣，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这位炊事员看见象个女人的耳环，马上把手放下，就这样从耳环说起讲了一节课。后来老炊事员病故，照例开个追悼会，方仲如在讲话中既讲了他的优点也批评了他不学习的缺点，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在追悼会上批评死者。

党中央对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非常重视。党校有一个班是长征过来的少数民族干部，还有一个班，是老工运干部，其中有的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这两个班都专门学文化。王国华，人称王老汉，原是桐柏红军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确山事变后回到延安，已五十多岁，留长胡须。陈云同志给他的任务就是学文化，专门配备一个学习秘书。这几位老宝贝，很风趣，有时候还找毛主席要酒喝。

党校真象个大家庭，领导与被领导、学员与工作人员、学员与学员之间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对人没有一点架子，

同学们对他也没有隔阂。在开荒运动中，同学们和他变工，替他种地，他给同学们作大报告，“平等互惠”。他在中央苏区担任过政治保卫局局长，犯过左的错误，肃反工作中伤害过许多好同志，很多人对他有意见。正因为如此，他很注意关心人，理解人，夜间从中央开会回来，遇见门口站岗的同学总要主动问寒问暖。同学们找他，那怕是聊天也从不拒绝。有位同学原是太原兵工厂工人，家有老母、妻子，实在放心不下，要求回太原老家，组织上认为过国民党和日伪军封锁线危险太多，希望他放弃出边区的要求，但他坚持意见，只好放他走。在边界他遇到了麻烦，又回到延安找党校，当时同学们认为他是政治动摇，脱离革命队伍，应开除党籍。可是邓发没有把事情看的这样严重，经过批评，介绍去工厂了。

谢老，当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患高血压症，每月发给优待大米若干斤，他自己舍不得吃，硬要送给医务所的病人。谢老真是忠厚长者，据说三十岁以后就不发脾气。他在边区政府任秘书长期间，给《解放时报》经常写稿，开辟专栏《一得集》，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我曾写信给他反映镇原审判员的一些毛病，他以我的信为由头发一通议论。

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说党校是锻炼党性的，马列学院是学理论的，党校培养的是作实际工作的干部，马列学院培养的是作宣传工作的干部，这种认识不正确。但党校很注意思想意识的修养是事实，每周过一次党日，一个个轮流自我检讨和相互批评，象“过关”一样。保密很强调，纪律规定不许讲真实姓名和家乡住址，不许向国统区写信，不许照像，党报的名字不公开，对外代号叫“中山图书馆”，这些搞法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党校熏陶过的人确实讲究修养和纪律，对以后的革命工作起到了奠基作用。

小组对生活用品提倡公用，毛巾、牙膏、烟叶放在一处共同

使用。朱琦是朱老总的儿子，每逢节假日总要从家里带来一半盒香烟，也必须公开献出来，凡吸烟者排起队一人一口。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延安的生活更艰苦了，七个月没有发津贴（每人每月一元），到十一月还穿不上棉鞋。没有家底的单位象女大、陕公只能吃煮麦子佐盐水。但困难没有吓倒共产党人，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的号召。从打窖洞、种谷子，发展到纺线、织布。延安人民的生活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很大提高，不仅学会了不少生产技能，而且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央党校与杨家岭（中央所在地）、王家坪一河之隔，门口有陕公大礼堂和广场，很多重要集会和晚会都在这里举行，党校同志得天独厚，经常可以看见中央领导同志。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是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广场举行的讨汪（精卫）大会。毛主席讲话中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种种阴谋。他很激动，声音越来越大，先是摘掉帽子，后来把大衣也脱了，这天很冷，刮西北风，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生气的样子。

一九四〇年夏天，毛主席在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的讲话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和颜悦色、妙语连珠，自问自答，深入浅出。他说蒋介石是不愿意实行宪政的，既不愿意，为什么还要开大会促呢？这叫做“刘备娶亲”，以假当真，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毛主席讲话鼓励人学文化。他说自己小时候读的是孔夫子的书，但也有益处，读了“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认得学习二字。现在的课本都是白话文，你们比我当年幸福，应该努力学文化。当时好多人很有远见，不但学理论，还钻研科学、文化，党校会计谢世纪就自修了两三门外语。

毛主席留长发，学者风度。裤子膝盖处有两块大补丁。参加晚会总是在开幕时悄悄入座，不惊动别人。

朱总司令是典型的军人风度，和战士一样剃光头，扎皮带，打绑腿，在暴晒的广场上给党校作报告，学员没有草帽，他也不肯一个人戴草帽。老总爱打球，延安的球场风气是先来后到排队，轮流上场，朱总自觉地和大家一起排队，有时候实在迫不及待就硬进球场，形成六个人对五个人，总司令争不过年轻小伙子，跑一阵子又自动退出场。朱总司令戎马一生，但从从不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他种的菜地在王家坪路边，人称老总菜园。过路的人们经过此地就向总司令讨西红柿吃，总司令就笑呵呵地说，自己动手么！老总有部汽车，自己不坐，经常放在仓库。机关干部要生孩子进医院，去找朱总借车，他从不拒绝，因此人称“有求必应”。象总司令这样的军人美德，在人民军队中并不少见。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行政专员王维洲就是另一位典型。老百姓不但不怕他，还送号“王善人”。这是多么尊敬而亲切的称呼呀！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广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医治手伤回来，一起回来的有蔡畅、邓颖超。受欢迎的还有从重庆回来的秦邦宪。周恩来带回苏联电影片子，他亲自放映，边放映边解说。

康生最怪，头戴鸭舌帽，鼻架黑墨镜，一口山东腔，讲话时香烟一根接一根，一口能吞进多半支，然后从口、鼻同时向外喷。他骑一匹黑色马，跟着一只叭儿狗，马跑多快，狗追多快。他的老婆曹轶欧是党校总支书记，不够骑马条件，经常是一路小跑。康生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长，住枣园后沟。他搞党内侦察，侦察工作搞反侦探、美人计。审讯工作搞逼供信、假枪毙、假活埋。由于在抢救运动中大量制造冤、假、错案，激起人们的愤怒，七大时没能进入政治局。但他不服气，把仇恨强压心底，

“文革”中时机一到又故伎重演，搞得比抢救运动还凶狠，把被他整错的人又统统整了一遍。他对陕西造反派代表说了一句“尚寅宾被揪出来了，好！”造反派对这句话奉若神明，到处宣扬“康老给尚寅宾定案了”，“永远翻不了”。他是个惯于制造内战、内乱、内讧、内耗的专家。国民党多年来想办而未办到的，通过康生的手实现了。粉碎“四人帮”后，对康生的罪恶也作了清算，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骨灰搬出八宝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定要报”，这句谚语终于在康生身上应验了。

一九四一年秋，学习毕业。冬，踏着大雪赴陇东工作。

1991.5